

毛澤東思想 和 儒學

劉青峯
金觀濤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毛澤東思想和儒學／金觀濤，劉青峯合著。
— 初版。— 臺北市：風雲時代，2006〔民95〕
面： 公分

ISBN 986-146-272-4 (平裝)

549.4211

95004151

毛澤東思想和儒學

作 者：金觀濤、劉青峯
出 版 者：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所：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5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78號7樓之3
網 址：<http://www.books.com.tw>
信 箱：h7560949@ms15.hinet.net
服務專線：(02)27560949
郵撥帳號：12043291
執行主編：劉宇青
美術設計：方瑜

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李永然律師
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版權授權：金觀濤、劉青峯
初版日期：2006年5月

I S B N 986-146-272-4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10樓
電 話：(02)2249-610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22759935

©2006 by Storm & Stress Publishing Co. Printed in Taiwan

定 價：28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退回本社更換

毛澤東思想 和 儒學

劉青峯
金觀濤
著



【毛澤東思想和儒學】

.....目錄

| | |
|-----------------------------------|----|
| 序 | 05 |
| 導言：兼論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研究方法 | 08 |
| 傳統及其現代變構 | 19 |
| 中國式社會主義和傳統——略論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 21 | |
| 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 / 37 | |
| 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 / 59 | |
| 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類型及演變 / 79 | |
| 文化革命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 / 95 | |
| 文革前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淪喪 / 103 | |
| 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禁慾主義 / 129 | |
| 唯物史觀與中國近代傳統 / 141 | |



隱蔽的意義結構：經典文獻新解讀 155

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大同書》中儒家與佛教的終極關懷 / 157

〈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 / 171

〈矛盾論〉與天人合一 / 185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馬列主義中國化 / 203

「老五篇」中的道德理想主義 / 217

理性化與經濟倫理 229

中國文化的理性精神及其缺陷——論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中理性的喪失 / 231

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論社會主義經濟倫理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 263

儒家文化的經濟倫理及現代轉型 / 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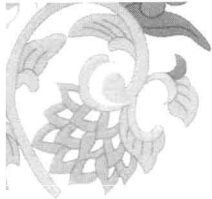


序

一九九六年我們編完這本論文集並為它寫導言時，深深感到思想史研究者的孤獨。當時，毛澤東去世二十年，中國早已進入一個與毛時代全然不同的全民熱衷於市場經濟的新時期，很少有人對研究毛澤東思想感興趣。這本編好的文集一擱就是十年。去年到台灣講學，學界友人問起毛澤東思想的結構以及它和中國文化大傳統究竟有何關聯。我們想找自己十幾年前發表的有關論文時，這才發現有些零散的文章竟很難找到了。這時，我們把這本打包十年、壓在櫃底的論文集又拿了出來，或許它的出版是有意義的。

今年正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文革研究者終於發現：如果不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深層結構和展開方式，是不可能認識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文革一代尚未進入歷史時，已有不少人，甚至是學者，開始唱文革讚歌了。我們在年輕時代經歷了文革，可以說，直至今日，我們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大多源於對文革的思考。因此，本書對今天文革思想研究者或許會有啟發。

這本文集所收論文，大多是採用韋伯所說的「理解方法」去研究中國共產黨文化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即力圖抽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並將其和儒學理念型比較，以揭示兩者在深層思維模式上的同構。當時，我們已開始寫作《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可以說，如果沒有前一階段對共產黨文化（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剖析，特別是通過文本解讀來發現毛澤東思想的隱結構，是不可能寫出《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一書的。如果將《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和本論文集對比，讀者也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差別。在這些早期論文中，我們用類



心學式或心學式的理學來形容毛澤東思想的深層結構，而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一書中，我們給出了更為準確的表述，將其歸為類似於宋明理學第三系的結構。此外，構成《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基本架構的兩個新概念「常識理性」和「道德價值的逆反」，都可以在這些早期論文中看到其成型的過程。

這就好像藝術家在構思創作一個大題材油畫或巨型雕塑前，必須要不斷地去畫那些摒棄主觀的解剖圖和素描那樣，研究者必須清醒意識到自己時時要和研究對象保持遠距離觀察思考；在投入畫大畫創作時，也正如畫家那樣，每畫幾筆之後就要不斷後退，以展望整體，避免被細部迷惑。我們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三卷寫作計畫，試圖探索中國現代思想起源和它令人迷惑的獨特性；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至今只出版了第一卷。先不說研究和寫作的艱辛，這種以百年為單位的宏觀著作，是不可能展開思想史細部討論的。而這部論文集就不同，它不僅使讀者看到構成大廈的磚塊如何鑄成，體驗方法，更可以分享研究者對毛澤東思想結構細部的解剖和觀察。因此，對於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索者，它或許更有趣。為了讓讀者從中更容易體會思想史研究方法，特別是文本分析如何與抽取理念型相結合的方法，我們保持了十年前該論文集的原貌，即使早期論文某些觀點尚不成熟，但它們更能反映思想探索的過程。

一談到方法，讀者或許會發現我們對系統論情有獨鍾。在十年前我們寫的導言中，已講明我們在運用韋伯理念型方法時已感到必須用系統論對其進行發展和改造，以便把握某種重大觀念的形成和演化。正如一九八〇年代我們用系統論改造馬克思典範那樣，我們在一九九〇年代的研究中一直在方法論上不斷地探索。是否可以把韋伯典範和馬克思典範結合，給出現代性和現代思想研究的新視野？正是我們多年來以致今孜孜不倦理論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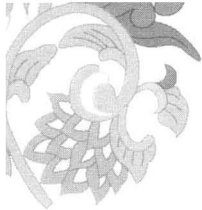
為自己十年前編輯但未出版的論文集作序，總難免有時光似流水的感慨。在這個公共思想似乎已經解體、思想正瀕臨死亡的新世紀，



其實，人比思想老得更快。對於思想史中沒有解決的問題，無論是當事人已經忘記或有意迴避，或者事後只有極少人有興趣；但對於學者來說，即使再孤獨，也最終不得不面對並不斷對其進行反思。因為，如果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當歷史回到當年力圖繞過之起點時，有切身感受的人可能已經或正在消失，一代新人已成長起來，他們從新的角度提出歷史發問時，歷史經驗可能結出荒誕的果子。願這些已經消逝或正在消逝一代人的反思給新一代研究者以啓示。

金觀濤 劉青峯

2006年1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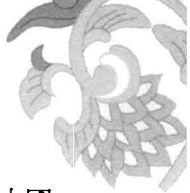


導言—— 兼論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研究方法

了解先前時代人類是如何思想的，要比了解他們是
如何行動的更重要。——伏爾泰

《毛澤東思想和儒學》收集了我們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六年發表的十六篇論文，主題是討論中國共產黨文化與儒家大傳統的聯繫。長期以來，學術界闡釋中國當代政治文化形成的主流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斷裂說」，即視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文化為傳統之中斷。正是通過這十六篇論文，我們對這一主流論說提出質疑，並嘗試採用新方法來分析中國當代政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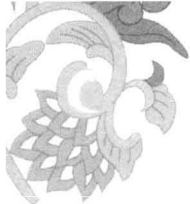
令人感慨萬千的是，這曾經是非常受社會關注的論題。記得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新加坡召開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前景」國際會議上，我們發表了討論有關問題的第一篇論文，提出毛澤東思想實為馬列主義儒家化觀點，曾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持新儒學觀點的學者堅決反對把毛澤東思想和儒學拉上關係，認為忽視價值本體而僅用形式結構來論述兩者的相似，並沒有說服力。另一些海外學人對中國文化傳統居然有改造馬列主義之能力感到驚奇。而在中國大陸，則有相當多學者贊同此觀點，因為它似乎表明毛澤東思想與封建主義的某種聯繫。當時，無論反對者和支持者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文化與儒學關係是一九八〇年代文化熱中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決定全力投入這方面的研究。我們感到，這一研究之展開也許有



助於解決當前文化討論中的某些難題。例如，根據「斷裂說」，中國共產黨文化可以看作五四全盤反傳統主義的產物，而要克服共產黨文化的弊病，邏輯的推論就是重評五四，並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而如果我們的觀點正確，那麼共產黨文化實際上已經是中國傳統的某種創造性轉化的產物。這樣一來，研究者應該分析中國文化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期人們為甚麼會在反傳統中接受傳統，也就是探索傳統如何左右著群體的潛意識，這無疑提出了更艱難而細緻的研究課題。然而由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社會對這一研究方向的關注並沒有持續下去。隨著中國大陸文化熱和思想啓蒙的中斷，中國文化的討論和學術研究完全改變了方向。

本來，很多大陸知識分子重視毛澤東思想與儒學的關係，是出於反對封建專制和回到馬列主義的熱忱，但六四後「封建主義」這一述語及其內容都逐漸被認為是虛妄的，那麼論證毛澤東思想的封建淵源還有甚麼意義呢？人們自然不會再對中國共產黨文化與傳統的關係感興趣。六四以後，在幻滅和壓抑的氛圍中，原盛行於海外的中國文化傳統由於共產黨興起而中斷的種種論說，在封閉已久的大陸學術環境中一下子成為顯學。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否定五四精神、國學復甦，新儒學的推介及研究異軍突起。一九八〇年代末以來文化研究的這種轉向，使我們成為孤獨的探索者，幾乎是單槍匹馬堅持原有的研究方向。

六四後，我們流亡海外，為了使一九八〇年代文化反思和理論研究不至於完全中斷，我們開始寫《興盛與危機》的續篇。一九九三年底《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們用系統演理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結構在西方工業文明衝擊下的變化過程及方式的著作。自一九九四年年初起，我們將學術視野轉向研究近代中國文化和思想史，力圖完成用超穩定系統理論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第三部著作。在所有這些研究中，有一個共同的基點，這就是發現中國傳統社會與一九四九年後建立的社會之間的



某種類似性。顯然，論證中國共產黨文化是中國大傳統的某種變構，就成爲我們整個研究中的重點。爲此，就必須去梳理一個龐大的問題群，它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第一，尋找共產黨文化的理念型(Ideal type)，並用經驗事實證明它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同構；第二，說明這種新文化形態的起源，也就是用理念型的對比來重構中國傳統文化轉化爲共產黨文化的近代思想史主線；第三，解決文化比較研究中碰到的理論和方法問題，特別是立足於中國近現代文化變遷的經驗研究來檢討西方理論的有效性。顯然，完全展開這三個方面的研究並非一兩個人的能力可以勝任的。我們只能從上述三方面分別選擇幾個問題探討，以此作爲我們宏觀研究的案例基礎，並證明這是一個有待開發研究的新領域。打一個不確切的比喻，展開研究新方向猶如開新礦，它並非個別人力所能及；但我們可以在可能的礦產區域鑽井來證明礦藏的存在。八年來的嘗試表明，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有待於展開的新研究方向。這也就是我們把有關十六篇論文結集出版的原因。

根據內容，我們將這十六篇文章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現代變構」，它是本書的第一部份；第二類爲「隱蔽的意義結構——經典文本的新解讀」，是本書的第二部份；第三類討論「理性化與經濟倫理」，它構成本書第三部份。這三類主題正好對應著我們前面所說的龐大問題群的三個方面。這三類問題中，第二類最基本，因爲它是有關中國共產黨文化理念型之討論。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介紹第二部份的文章，以便顯示本書十六篇論文的論述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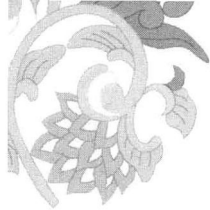
顯而易見，要揭示共產黨文化是中國傳統的變構，最困難但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抽取共產黨文化的理念型，並用證明它在某些方面與儒學同構，用理念型來界定文化價值系統的形態，是比較研究的第一步。韋伯認爲，正因爲人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研究者也就可以根據自己對某種文化的「理解」來抽取其各種價值間的理想化關係或終極關懷的形態，從而得到這種文化各個方面的理念型。而對於另一個



有同樣文化體驗的人，該文化理念型的「可理解性」，也就成為對它的驗證。舉一個例子，經歷過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者大多都知道毛澤東思想是一種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者為目標的道德理想主義，在對待知識的態度上它採取同王陽明心學類似的立場。由此，思想史學者可以根據自己對文革精神的理解抽取其道德理想主義的理念型，並將其與陸王心學作比較。而對於另一個既有文革經歷又了解儒學的研究者，他就可以根據自己在這一文化中生活的經驗及知識，來判斷別人抽出之理念型是否正確。韋伯提出的這種「理解」方法，同時也是證明理念型是否成立的方法。

一九八九年前，我們在中國國內做有關研究，讀者和學術共同體主要是大陸知識分子，用韋伯的「理解」方法來抽取並證明共產黨文化的理念型是可行的。但是當讀者和學術共同體沒有在共產黨文化中生活的切身體驗時，上述方法就會遇到困難。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的一個新儒家研討會上，就有台灣學者指我們不識時務，質疑我們：「你們過去在大陸批判共產黨文化與傳統是可以理解的。現在你們在香港做研究了，為甚麼還不改變立場，繼續做這種研究？」確實，如何讓沒有共產黨文化體驗的讀者和學者「理解」我們抽出的理念型，是對我們研究的重要考驗。今天，不僅海外學者沒有共產黨文化生活的切身體驗，即使現在生活在大陸的年輕人也已很難理解大躍進和文革了。為了有助於我們民族歷史記憶的恢復，必須去尋找一種比韋伯提出的「理解」更有效的證明理念型存在的方法。

所謂一種新研究方法的發現，大多都來自於對它所指涉對象的重新發問。一九九〇年代初，當我們重新閱讀毛澤東著作時，突然發現居然很難讀懂這些在我們青年時代幾乎倒背如流的「毛選」。如果我們仔細推敲毛澤東著作中的論述，就會感到其前提和結論之間往往沒有邏輯一致性。這個發現之所以觸目驚心，並不是我們真的讀不懂毛選，而在於我們青年時代為何沒有今天這種感覺，以致於認為毛選中的論述是簡明而理所當然的呢？我們終於恍然大悟，今天讀毛選時



覺得難以理解，是因為我們心中已不存在毛澤東思想所規定的文化思考模式。任何一種文字論述，都不能窮盡某一種文化價值展開所需要的一切邏輯前提。當一種思想模式是人所共知、習以為常時，就可以略去論述中很多必要的前提。但對於不了解這種文化的人，被略去的東西往往是更重要、更本質的規定。因為經典著作論述的有效性，必須以這種規定已經深探地支配著系統中人們的思想為條件。青少年時代，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思想主導一切的環境中，潛在的文化思考模式使我們對毛選心領神會。而一旦走出這種文化結構，語義中的邏輯空缺立即顯現，毛選也就變得難以讀懂了。這種體驗使我們意識到，只要提出毛澤東思想有關理念型，就能重新解讀毛選；而解讀過程也可以向沒有這種文化經驗的讀者顯示某種理念型的存在。

事實上，一九八八年我們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儒家化的觀點，正是基於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新解讀。但是，毛澤東著作與劉少奇的《修養》最大的不同在於，毛澤東很少像劉少奇那樣直接引用儒家經典，表面上毛澤東著作往往與儒學無關，甚至是反儒的，這就使得解讀毛選更具挑戰性。我們最先是分析被稱為毛澤東思想哲學基礎的〈實踐論〉。果然不出所料，我們在〈實踐論〉中找出了和王陽明心學類似的潛在邏輯結構。只有揭示出這種未曾言明的結構，才能理解毛澤東的推論邏輯，明白為甚麼〈實踐論〉在毛澤東思想中如此重要，以致它可以成為推翻黨內熟讀馬列經典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理論權威（毛稱之為本本主義）的精神武器。與〈實踐論〉並列、被稱毛澤東思想哲學基礎的另一文獻是〈矛盾論〉。表面上看，〈矛盾論〉是毛澤東徹底反傳統的最好證據，儒學講中庸和諧，而〈矛盾論〉強調鬥爭哲學，它常常作為共產黨文化是傳統斷裂的重要證據。但我們的新解讀卻發現，〈矛盾論〉的整個論述都建立在一個未曾言明的前提上，這就是「天人合一」，而它恰恰也是儒學的最基本結構。毛澤東正是利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改造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用矛盾來表達儒學中將宇宙規律與人的道德理想



合一之「天道」。接著，我們又解讀文革中被稱為「老五篇」、指導億萬民眾修身改造世界觀的毛澤東五篇文章，抽取出土革期間毛澤東所倡導的以無產階級立場為目標的道德理想主義的理念型。由此可以發現，毛澤東所倡導的是一種具有「心學化」特徵的道德理想主義，它明顯地不同於劉少奇《修養》一書中所代表的「理學化」的道德理想主義類型。這兩種類型的差別，恰好可以解釋文革中毛澤東思想對劉少奇《修養》的批判，以及共產黨文化形態之變化。

我們相信，將近年來由闡釋學發展出來一整套文本解讀方法與社會學的「理念型」研究相結合，不僅使韋伯提出的「理解」方法變得更具體和可操作，而且還為不具有某種文化體驗的讀者理解與研究該文化提供了輔助。經典文本是一種客觀存在，只要它足夠豐富和複雜，成功的解讀就往往有如破譯密碼。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又選擇康有為《大同書》為解讀對象，研究其烏托邦思想的理念型。我們完全沒有康有為時代的文化生活體驗，因此，解讀《大同書》更可顯示這一方法的有效性。

抽取共產黨文化的理念型並證明它在某些方面與儒學同構，只是研究共產黨文化與中國文化大傳統關係的第一步，據此可以進一步探討共產黨文化之起源。我們將這方面的研究冠以「傳統及其現代變構」這樣的標題，它就是本書的第一部，它們都屬於文化變遷的理論研究。本來，應用文化變遷理論來研究共產黨文化有很多困難。因為共產黨文化是一種現代形態的外來文化，它在引進本土的傳播和成長過程中，糾纏了數不清的歷史與現實、外來與本地、現象與本質的各類問題，以致於文化變遷的原因如同一團亂麻那樣難以理出頭緒。而抽取理念型的方法，恰恰是去把握文化價值本質規定性或關聯。因此，比較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型和共產黨文化的理念型，並揭示其變遷的機制，就可以把握文化結構演變的主線。

在討論共產黨文化的起源方面，我們一共寫了八篇論文。我們研究了當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烏托邦精神氾濫的原因，並分析它們同中國



傳統政治文化的關係。除烏托邦主義外，還討論了科學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知識分子道德勇氣的理念型及其變遷。我們力圖證明，五四後席捲中國的「科學主義」不同於西方科學主義，它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以常識理性來反思並重構意識形態的某種表現。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態和變遷也不同於西方，它是傳統華夏中心主義的變構，並隨著中國大陸再次建立道德理想主義意識形態而轉變為文革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我們解釋了為甚麼共產黨文化具有傳統文化所沒有的禁慾主義特徵，以及知識分子道德勇氣之淪喪；還進一步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信奉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與王船山哲學的同構性。這些研究共產黨文化形成的論文，既是思想史的個案分析，也都是圍繞著觀念演化史。

如果從方法論角度來比較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文章的內容，讀者可以感到，第二部份的方法是用文本解讀來抽取和證明某種文化觀念的理念型，可以說是韋伯社會學方法的運用和某種補充。而第一部份中的文章所用的方法，可以歸為「用理念型前後的差異來把握文化形態變遷」。表面上它似乎也是韋伯命題的延伸，然而實際上就處理變遷的方法論而言，我們的思路已不同於韋伯。眾所周知，韋伯之所以高度重視理想類型的劃分，目的在於研究社會和文化的演化，也即通過理念型分析來揭示哪一種理想類型（如宗教倫理）是有利於演化的（如促使資本主義興起）。然而韋伯生活的時代，尚沒有出現系統論和結構穩定性概念，他不可能知道，用理念型來直接解釋演化是不適宜的。根據系統演化學理論，某一種固定類型的存在，必須滿足結構穩定這一條件；不具有結構穩定的形態也沒有類型論上的普遍意義；而演化是從一種結構穩定的類型向另一種結構穩定類型的變遷，是不能用兩種結構穩定的類型的中間狀態（也即不穩定態）來說明的（雖然研究者可以將其歸為某種理想類型）。在系統演化論看來，中間狀態一般都不具有結構穩定性，它只是存在於抽取它的特殊案例中，而沒有普遍的解釋意義。



事實上，當韋伯把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關係的分析推廣到非西方文化中去時，已經出現上述困難。就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形成而言，韋伯命題極具解釋力，即喀爾文教的特殊精神狀態也許確實是促成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產生因素。但是新教倫理作為基督教經濟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某種過渡狀態，只是西方文化的事物，它並不能普遍說明其他文化為何沒有自發產生資本主義。例如我們不能根據中國文化中不存在「天職」、「入世苦行」等精神，來解釋為甚麼中國文化沒有孕育資本主義精神。其實在東亞和中國文明研究中，社會學家一直陷於必須運用韋伯理論但又不能套用韋伯方法之兩難，這正好說明直接用理念型來把握演化造成的困境。

我們用理念型之比較來分析演化，是試圖把韋伯發現的理想形態分析方法和系統演化論結合起來，尋找把握文化演化的方法。早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我們就開始建構一種系統整體演化方法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和形態。在我們關於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討中，和經濟政治相比，文化思想一直是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因此，我們近年來的研究又吸取了韋伯的理念型分析方法，這樣才能將系統結構演化論運用到文化變遷研究中。確實，方法上的突破有助於解決當今社會學中將韋伯命題擴展到中國和東亞所帶來的種種難題。我們這些探索構成了本書的第三部份，稱之為「理性和經濟倫理」研究。

第三部份雖然只有三篇論文，但卻包含著我們試圖重新審視韋伯命題，並將其放在一個更為普遍的架構下來解釋之雄心。〈儒家文化的經濟倫理及現代轉型〉一文提出了分析傳統經濟倫理向資本主義精神轉化的一般構架。根據這一基於理念型轉化而得到的模型，我們發現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在孕育資本主義精神時所面臨的困難是不同的。後者的障礙主要是如何將「求利動機」合理化，而前者的難題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和私有產權的規範化與合理化。正因為兩種文化面臨的問題不同，韋伯針對解決「求利動機」合理化的新教倫理促